

汤佩松^①

地点：北京中关村 810 楼家中

时间：1994 年 11 月 2 日下午



汤佩松

汤佩松，1903 年生 湖北蕲水人。1914 年赴日留学 两年后回国。清华大学毕业后留美 获博士学位。为生理学家 有重要科学成就。1948 年为中研院院士，1993 年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
②李大钊（1889—1927），河北乐亭人。1913 年进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，1916 年回国。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。

钟少华（以下简称钟）汤老先生 您现在恐怕是在世中国人里面，最早去日本留学的人了。您是 1914 年去日本的。您还记得当年的情况吗？

汤：要说也很简单，我倒觉得要从一本书谈起 有一本书叫做《念念不忘李大钊^②》，书本身没多大意思。我小时是李大钊照料 我很佩服李大钊，但是他很内向 不摇旗呐喊的 他做人修养很棒 但我没有从他那里学到一点马列主义什么的。我所以能够去日本，

是因为我父亲^①想叫我去日本，他佩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。我那时 11 岁，他叫我母亲、姐姐都去，把我托给李大钊，李大钊是他的得意门生。那时不少人出国去勤工俭学，父亲想把我送去培养。那时我家在日本方面也有私交。

钟：您全家是坐船去的吗？

汤：是的，坐船去的。那是很有意思的，正好是欧战期间，从天津上船，船走了 15 天。因为怕德国潜艇，船在晚上走，白天避港中。船是日本的，直接到东京，我国驻日本大使馆有人接。我们没有住官邸，在外面租了一间屋。

上学是在目白学校，贵族学校。我的日语学得不好，在目白学校期间又在同文书院上课。说在目白中学是一个名义，实际在同文书院学习。我那时很小，记得见过校长，名字忘了。我上课时，老师讲的，我只能片断懂得一点。教室里有 20 多人，十几岁的，全是日本贵族子弟。我进去之后，感到很别扭，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，我就有一种压迫感，我反抗，几乎不肯去上学了。

钟：您与同学的关系就很难处了。

汤：一点也不错。我在那儿可以听课，没有要求我同别人一样来往。有些课不要上，武士道课则是绝对不许我上的。我偷偷跑去看，在房间外边看。有击剑，我喜欢。

钟：哦。是日本学校当局禁止您学，因为您不是日本人的缘故？

汤：是呀，绝对不许上的。

指汤化龙。汤化龙（1874—1918），清末以北京进士馆官费留学日本，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，1908 年回国。曾任辛亥革命后共和政府总长，参议院副议长、议长。1918 年 8 月在美国旅行时遭暗杀。

钟：那恐怕是他们心目中的精华吧。

汤：我只能学一学相扑，是上课学的，但是真正比赛是没份参加的。所以我一上来就反感。

钟：课本用什么？

汤：课本是日文的，有的内容我背得下来：

“风筝 风筝，飞上去。用线一拉往下跑。”

钟：那您学习还是有兴趣的。

汤：我相信老师对我没有什么偏见，他的责任就是教你，他并不特别补课，一视同仁。教课严格。

钟：外语呢？汉语呢？

汤：我的英文好，汉语不行，在日本学的汉语。因为我母亲去世，我又回到北京读书。父亲指定我到师大附中，从一年级重头读过。这是特别照顾，校长姓韩。初中一年级时，我还不知道作文、修身，日本没有这些学习内容。

钟：您在日本时，放假有没有去什么地方旅行？

汤：有。日本好就好好在这儿，远足，秋天红叶，满山花开。每次我们至少游一天。是在东京附近，不是上野。上野那儿是看樱花，很有意思。

钟：有没有文艺活动？

汤：看电影，无声电影。

钟：学生能不能上街去？

汤：可以。我喜欢在街上跳电车，车一开，我跑着跳上去，在车边扶着拉手。免费乘车，还勇敢。

钟：司机不管吗？

汤：司机不管，车上也没有几个人，喜欢看小孩子跳着玩。车是有轨的，速度也慢。我到学校的路上没有车坐，上学走着去。

钟：您上学穿中国衣服？

汤：穿日本校服。

钟：同学间讲究些什么？

汤：除了有时候打架、玩耍。因为我们不属于一个阶层，所以没什么话好说。有的，是穷一点的同学，饭不够吃。人少时，他们就来讨吃的。当时我们都带便当，我母亲对我好，便当里鱼呀肉呀都有。

钟：那么每天带着小书包、小便当上学，下午才回家？

汤：是呀，下午回家。早上 8 点钟去，有个大同学接送，下午四五点钟回家。

钟：您当年的同学还有在世的吗？

汤：一个也记不起来了。我回到中国后，我父亲在美国被害死，运回来，停灵在先农坛，很多日本人来看望。我在守灵，就都问我预备如何料理后事。

柳步青^①

地点：北京口腔医院宿舍

时间：1994 年 11 月 3 日



柳步青

柳步青，泰国华侨。1927年在中山大学学习。1931年赴日本留学。1946年回国。东京大学医学部选科、千叶医科大学本科毕业。现为北京口腔医院名誉院长。

钟：很高兴能够见到您，想请您谈一谈您在 30 年代到日本留学的种种情况。您是怎样去了日本的？

柳：我们那个时代呀，今天实在是说不清楚了。我是泰国华侨从小在曼谷。祖上都是从广东去泰国谋生的，老家在广东大埔山区，那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穷地方 开门见山的。所以有点办法的就往外走。我是在 11 岁才回到大埔的。念完小学和大埔中学 我就到广州市。当时正好是北伐战争的第

二年，我到中山大学念书，还听过鲁迅先生的课。由于我在中学时，有位老师是秘密的共产党员，当时叫做 C·P 他发展我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叫 CY。我到中大，跟 CY 联系上了，也参加工作。国民党开始清党，捉到共产党员不审就杀头。中大 CY 的秘书也是我们乡下人，有一天他家不小心给暴露了，搜出 CY 的名单。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就到中大抓人，名单上我填的名字是柳尽晓，他们查了半天也没有此人，也就暂时放弃了。别同学来告诉我说：“警备司令部要抓你，你想法走吧。”我买了张火车票就去了香港，后来又去了泰国。十几岁的人，没有工作，我住在我一个做医生的表哥家里，帮他做点事情。我还是想念书，怎么办呢？当时泰国华侨人很多，中华总商会就替代领事一方做事，如慈善事业有善堂、医院什么的。也有一种贷学金，跟奖学金有所不同，你毕业之后要分期还钱的。我找了保人，报名考试合格，就给我钱了。后来等我在日本的大学毕业，由于通货膨胀，贷方已经无意索回。

我在 1931 年 12 月，从曼谷回到汕头，到市政府领取外交部的护照，然后到日本驻汕头的领事馆，门房收了我给他的 3 块钱，带我到领事面前。领事问我几句话，就在护照上盖“入国签证”章和签名。我拿到香港就上船了。船是加拿大的邮船，很大，约有万吨吧，两周一次航班。我乘的经济仓是 15 元一张票。我在泰国时学了点日语，但一用就不行了。幸好在船上认识一位早年在东京工大的学生杨君，由他照应。我们在神户上岸，乘车去东京。我仅在香港买了件毛衣穿，下身还是单裤，冻得我手脚发僵。

住下之后，老同学就领我到神保町的东亚日语预备学校报名上学，记得是在“水道桥”车站下车。开始我住在杉井区。我心里很着急，想早点上大学，一早起床，看同学还在睡觉，我



东京神保町路口（1934年）

就勇敢地出门上学去。坐上“省电”，越看越不对，一下子就到了“东京”站。我决定往回走，不巧又上了快车，刹时间又回到原地方。无奈，我只好下车，用英语问车站工作人员。他用日语回答，我不懂。一急之下，我用泰国语问他，他们更是不懂。等我拿出车票给他们看，他们才了解我的意思，指示我过天桥去乘另一列慢车。那天我起了个大早，但到学校已是最迟的一个了。还有个同学更有趣，有一次他想买鸡蛋，别人教他：鸡蛋的发音是“Tamago”相当于中国话“他骂我”，记住“他骂我”就好了。他到商店里买鸡蛋时，把顺序给颠倒了，对人家说：“我骂你”。售货员听不懂，他又改说：“你骂他”。人家还是不懂。最后他才想起说：“他骂我，他骂我”。售货员笑起来，给了他鸡蛋。

钟：您在学校上学的情形如何？

柳：当时在东京有一个“中国留学生监督处”，是教育部的派出机构。中国学生要想考日本的大学或专科学校，必须有监督处的正式介绍信，规定每人只介绍 3 个学校。如果这 3 个学校都考不上，就只好再等下一年。我初去时，本想进医科大学的，因为没有被录取，所以才进东京齿科医学专门学校。东京齿科是老牌学校，每年级分甲乙两班，每班 100 人，4 年毕业，学费也比较高。我一直没有申请官费，全靠那点贷学金，后来也参加点工作。我在东京住的“贷间”，生活很方便，同房东老太太关系很好。后来我进千叶医科大学时，她还经常到千叶来看我。我自己在外面吃饭，定食一份是 1.5 角钱，吃了好多年。

医科学习要求比较严格，不准缺课。前期基础课学完，有前期国家考试，合格才能升进后期临床课。缺课 1/5 的就不准参加考试了。所以学习都很紧张，每星期都排得满满的，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。

1936 年 12 月的“西安事变”消息，传到了日本，在中国留学生里也引起一些波动。有人主张应该将蒋介石赶紧干掉；也有人如丧考妣。当时驻日大使是许世英，这位先生在老官僚里算一个庸碌之辈，日报形容他如同女性。事发时有日本记者问他：“蒋介石被抓后，蒋政权前途如何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们国家只有国民信赖的政府，没有什么蒋政权。”

1937 年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前，日本学校正放暑假，一般从 7 月到 9 月上旬，大多数人都离校去避暑。我去了伊豆半岛海滨，那里有专门租给学生的房间，自己做饭吃。每天早上看书，午饭后睡一会儿，2 点下海洗浴，晚饭后散步或参加活动等。街内还有温泉風呂（浴池），不但水温高，而且泉量大，还有温泉游泳池。温泉浴池是男女混在一个浴池里洗浴的，起初我不大相信，等进去一看果然如此，而且大部分是女的。我想

不对要退出来，但再看还是有男的，所以我也就安心地洗下去了。日本人洗澡的方法和我们不同，他们先用水净身擦背，最后才进池子里面去泡一泡，所以他们池子里的水很干净。同时他们有相互擦洗身体的习惯。我在乡下同学家里做客时，在他家里洗澡，他妹妹就问过我：“要不要替你擦身？”他们从小就有这种习惯，男女在一起也就不会和我们一样的大惊小怪了。

芦沟桥枪声一响，日本军国主义者十分嚣张，报纸上每天都是“支那军阀残暴杀害帝国臣民”、“暴支膺惩”等标语。我赶回东京，留学生们大多回国去。我们几个泰国留学生商量，留下来再看看。因为我还有一年就毕业，舍不得半途而废，就留下来了。一直到 1946 年 8 月回国止，我在日本学习毕业，过着和日本学生完全一样的生活。

我在东京齿科毕业后，一面工作，一面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选科。因为我看到，日本的医师和牙科医师分得很清楚。医师可以干牙科，而牙科医师则绝对不能够侵犯医科业务。牙科医师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，日本叫做“医齿者”，就跟中国的“镶牙匠”差不多。有一次我去拜访东大齿口科金森教授，在他的住宅附近找不到，就问邻近居民。我刚说出金森教授的名字，他就若有所思地轻率回答道：“啊，是那医齿者吗？”这句话真是刺痛了我的心。当时我想，金森教授是东大医科毕业的，也是医师，算起来，在世界上也是有数的名家，就是因为主持齿口科工作，便被打下十八层地狱，列入“医齿者”行列。这也就是我决定再进医科大学的动机。到后来，我又考进千叶医科大学本科，一直念到毕业为止。

钟：您对社会生活有什么回忆？

柳：1943 年起空袭频度加紧后，日常生活深受影响。千叶大空袭时，学校教室全部被毁，医院也损失严重。我的手脚都

受过弹片伤。这时所有的同学都被征召入伍当军医去了，我只好写信给一位同学的父亲，问他能否让我暂时到他乡下去避一避，可以帮帮农忙，条件是只要给我口饭吃。他父亲回信说，可以赶快去，不但管饭，还有相当的薪水。原因是他们村里迁来许多工厂，眼下正缺一个医师。我就去生活了一年时光，也算我体验日本民间生活最有意义的时光。地点在长野县户仓町，我在这里不但上班，还学会骑马和滑雪，而且还有一段没有演完的“罗曼斯”。原因在我同学的大妹妹，她当时是专科毕业后闺中待字。我住她们家，不用说她父母很客气，尤其是她对我照料得无微不至，这真叫我有些为难。衣服脱下来抢着就拿去洗，连我喜欢吃什么、爱好什么，她也调查得很仔细。逢到我回千叶，她每天都有信来，写得很有感情。不过我在东京时已经有了女朋友，她是东京出生的华侨，家在上海，因为空袭得太厉害，已先我回国。而且，我母亲曾一再叮嘱，千万不能在日 本结婚。因为我舅舅也是留日学生，他带回一位日本籍的舅妈，结果弄得很不好。

还有一件事，是我在大学毕业后，到内科教室当助教时期。同期也有一位从女子医专来的，大家工作特别忙，但她总是对我照顾特别好。她是独生女，为了继承产业，就得招女婿入籍。我是个中国人，根本没有这种可能。但有一次她误会了。中午饭后，我们在屋顶上散步，无意间谈起这种招女婿的风俗，我说：“原来是请进来吗？(ソウカ来ッテ貰つノカ?)”她误以为我是向她求婚，立即一本正经的回答说：“我那里配呢！(トンテモナイ,先生,私ノ样ナモノ!)”其中是含有可以商量的意思的，我可无话可说了。幸好我很快就回国了，迩来 30 多年，这两位后来都和医师结了婚，生活都很幸福。1978 年我去日本旅行时都碰上了，互相间还回忆了这段往事，重温了这种不

可思议的“缘分”，或者说是“命运”吧。

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也很深重，今天没有时间多讲了，再讲一个小故事吧。有一次，我同学的兄弟被征召入伍，营地就离千叶市不远，他家来信要我去看他，同时捎点吃的东西去。我拣了个星期天，带了包年糕去看他。营房会客地方有宪兵巡查，不让带食品给军人。见面时他说每天吃不饱，夜里很饿。我告诉他带年糕来了。他非常高兴，瞒着我离开一会儿，等宪兵走后他才回来。我问他去哪儿了？他说上厕所把年糕都吃了。我觉得实在可怜，国内士兵都饿得这样，你这个仗怎么还能打呢！

林 林^①

地点：北京崇文门东大街 22 号

时间：1994 年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20 日



林 林

林林 著名作家。1910 年生，福建人。1933 年 6 月赴日留学。1936 年回国，曾任报社编辑和大学教授。1949 年后任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、中日友协副会长等。著有诗词、俳句、散文等作品。

钟 林老 您当年以一个 30 年代学生身份前往日本学习，成为那个时期的见证人，我希望您能给现代青年人讲一讲 您当年怎么去的？

林 好啊。现在有一些事情记得还清楚，有些记得就不清楚了。

留学前，我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，从 1929 年到 1933 年 4 年制的。读正规大学要 6 年。我是在政治经济系，当时这个大学是左派教授多，学习也比正规大学自由一点。我的老师 有名的陈豹隐教授讲政治

经济学，他对我的影响最大。陈启修，名豹隐，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，是他把《资本论》第一个翻译成中文的。他当时用的教科书是河上肇的《经济学大纲》中文本，自然其体系是马克思《资本论》体系。施存统也是我的教授，他讲一点苏联的哲学。侯外庐来讲国际政治。那时陶希圣也在校内讲课，他讲政治课，我们那时思想左倾，上课还给他提些问题，为难他。还有刘彦，他讲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，这课对我们有启发。这个大学，后来才知道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，头一任校长是黄兴，我上学时是王正廷，他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来挂名兼任，实际叫教务长管理。

1931年，日本侵占中国东北，我们不满意国民党的安内攘外的投降政策，思想就更左倾了。当时日本的普罗文学大批介绍进来，鲁迅先生就是首先介绍者，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的文艺政策、作品什么的，还有郭沫若的《女神》诗集，看了很有兴趣。我觉得毕业后留在国内找职业也不怎么好，就有心到日本去多学习一些。

1932年我开始学习日语，请了一位老师，叫张仲直。他说能否组织30个人来学，他就专门来教课。我去和同学们说了一下，他们都愿意学，于是我再贴一张广告，结果有一批同学来学，他就来上课，从字母开始，分初级班、高级班。我记得我还跑去听台湾来的张我军教授的课，他不在我们中国大学，但

张我军，1902年生。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，留日，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。回国后，长期在北京一些大学任教。翻译的日文书有：《人类学泛论》（西村真次原著，1931年版）《现代日本文学评论》（宫岛新三郎原著，1930年版）《文学论》（夏目漱石原著，1931年版）《现代世界文学大纲》上卷（千叶龟雄原著，1930年版）、《中国人口问题研究》（饭田茂三郎原著，1933年版）《法西斯蒂主义运动论》（今中次磨原著，1933年版）等。另外尚有学习日语教材多种。

他讲得好，他在文字运用方面，文学气重了一点。本来我们校内就有日语功课，由于我们的教务长夫人就是日本人，她来教这个课。我在校内就应该听这位夫人的，但她教不好，为人倒是挺好的。我们学了近一年的日语。我还买了本日文书《贫乏物语》来学习，我自己学着翻译，原书是河上肇写的。后来他还写了第二部，修订了第一部的观点。他是个认真的学者。我自己学习翻译一些小文章，投给报社，居然在报上发表了。我还将发表的文章寄给日本的原作者，原作者也挺高兴。这是我学习日语时的大体情况，这样到出国时才能应付。

那时去日本，挺方便，不需要护照。学校开了一封介绍信给轮船公司，就买到船票了，用不着去使馆。这样在 1933 年 6 月，我就上船到日本去了。船是货船，从天津塘沽走的，没有麻烦，就直达神户。也没上街，乘火车再去到东京。当我在国内时，已经有老乡在东京学习，介绍我去找早稻田大学的姓卢的同学，告诉我说去找他就可以了，后来姓卢的介绍一位台湾同学帮忙，我就进了早稻田大学本科。我原来读经济学科，读了一个学期，觉得不对路，没兴趣了，就不愿意学了，随便去听别的课。那时早稻田的文学有名，有著《小说神髓》、翻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的坪内逍遥等名教授。我住在早稻田大学附近鹤卷町的民房的贷间，有 3 席大的小房间，房东是工人，房子在一个小巷子里。吃饭就在附近一个广东食堂饭馆里，一顿饭要两毛钱，有猪蹄、猪肝什么的可吃，那是日本人不愿意吃的。在日本花费同在北平差不多。

钟：那么，后来您就钻进文学里了？

林：在早稻田大学的附近高田马场，有一家海涅^①茶店，我

海涅 (H·Heine, 1797—1856), 德国诗人。

看茶店里放有诗人海涅的各种照片、书籍等，喝杯咖啡，可以半天沉醉在海涅的环境里，我成为这茶店的常客，就对海涅有兴趣了。那时关于德国文学，有森鸥外先生的介绍，有海涅也有歌德。后来我翻译海涅的诗，根源就在这个吃茶店。我当时就渐渐了解日本翻译海涅的书的情况，我自己也学习从日文再翻译成中文。我先选译了三首海涅的诗，就寄给上海的一家杂志《世界文学》，它就刊登出来了。这是头一次，我挺愉快，后来逐渐读海涅的书了。我在早稻田大学的同学不少，同你的父亲（钟敬文）也是在学校里碰到的，我们互相打招呼，谈起来，他那时是来客座研究，我们是同学和同乡。后来 1948 年在香港，你父亲还给我翻译的《海涅诗集》写过序言。

1934 年我参加了左联 东京分盟，大约有 30 人左右吧 不久我被选为该盟的干事会干事，和丘东平在一起工作。左联同志和盟外同志共同编些杂志，爱小说的成员就编一个《东流》杂志；爱杂文的就编一个《杂文》杂志；还有爱诗歌的就编一个《诗歌》杂志。我就是参加《诗歌》的后期编辑。《杂文》的编辑，一直由邢桐华负责。那时还翻译一套苏联的文学理论丛书，郭沫若^② 先生带头译马克思的论文，我也参加翻译高尔基的《文学论》，日文书中有删节的地方，邢桐华就从俄文给我再翻译来补上。

左联，为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之简称。1930年 3月在上海成立，由中国共产党中宣部领导。提倡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学。1936年春解散。其东京分盟办有《东流》、《新诗歌》、《杂文》等杂志。

郭沫若（1892—1978），四川乐山人。中国作家、史学家。1913年赴日本留学，1923年回国。参加“创造社”，参加北伐。1928年流亡日本，1937年7月回国参加抗战。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。代表作有：诗集《女神》、历史剧《屈原》、译著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》（河上肇原著）专著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、《李白与杜甫》等。



东京银座街道（1934年）

我搞左联组织工作，被指定跟郭沫若联系。郭先生对我很信任，我要他到东京开会，从无拒绝，乐意花宝贵时间，参加活动，指导青年。我有时去千叶县看他。那时他家六七口人，全靠他一支笔来养活。他有时带我们出门在附近散步，在周围荒田上随便走走。他会问这是什么花？那是什么草？我们答不上来，他就说：“搞文学的人，应该懂得这些知识。”那时他的小儿子郭志鸿慢慢地跟在我们的后面。

日本当时普罗文化比较发达，我也是爱看点短的作品，像诗歌、随笔、短篇小说等。我翻译过德永直的短篇小说《马》，在北平《盗旦》杂志发表。还翻译过苏联研究日本文学的文章，在吴承仕主编的《文史》上发表，我自己也学习着写一点，记得写过学习海涅的文章。我主要是学习写自由体的诗，还寄到

国内发表过。我比较有兴趣研究的，就是海涅，我见到他的书就买，还记录了当时日本翻译海涅的全部情况，可惜我的日语理解诗歌的程度还不够好。我对海涅有好感，1983年头一次到巴黎，就跑去蒙马特公墓，到海涅墓表示敬意。现在日本的海涅研究家铃木谦三先生夫妇，还陆续寄《海涅研究》给我，实在令我不胜感谢。

钟：您在留学期间，参观过什么地方？

林：我和同学一起去过东照宫，那里的人工建筑适应自然环境，自然美和人工美调和。日本建筑跟西洋大不同，西洋的建筑传统是宏大，很有伟大气派。东照神宫则与周围环境协调，雕栏画栋，是东方味道。日本画也有它的独特味道，画一株牡丹花下，有一只猫在睡觉，这跟中国很不同。也有画三只猴子，各自闭眼、掩耳和堵口，表示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，看了觉得很有趣。日本的自然美也是独到的，枫叶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的，种类也多，只有东山魁夷才画得出来吧！东照宫的山顶上还有一个大湖，叫中禅寺湖。你走上去一看，哦，原来是水源头！山下的瀑布是从那里流下来的。还有一个印象，是路边落叶和枯枝，日本人认为是美。这跟日本茶道有关，茶道创始人千利休，他老人家把一些叶子从树上摇下来，认为这才有诗意，是自然美。这是禅宗的美学观，不求对称，不求一味繁荣，要有颓败的东西，要有天龙寺那样的枯山水。这样才有兴和衰，符合自然规律。

我还偶然到过不叫红灯区的红灯区，那儿叫玉之井，在东京，离早稻田大学较远。为什么去的呢？起因是读小林多喜二的短篇小说《为市民》，里面讲一个青年人的事，他有一天上街去，碰上电车工人罢工，他认为市民应该做好事，就自愿去开车。忙了一天就喝两杯酒，又到玉之井走进妓馆，在妓馆里自